



人生自是有情痴

——读《红酥手》

徐俊民/文

爱情与死亡,是文学创作中最永恒又最难以言说的主题。生者未经历过死亡,死者无法向生者揭示死亡的真谛,故圣人云:“未知生,焉知死。”生与死,皆是谜团。爱情,谁又能说得清?刘兰芝毅然投池,焦仲卿自挂东南枝;林黛玉泪洒一生,贾宝玉遁入空门。这些古典悲剧中的爱情标本,在《红酥手》的“梦游体”叙事中,被赋予现代性解读。

在《红酥手》中,郑凌红将这一生死二元对立的哲学命题,解构为爱情光谱的两极:唐婉饮下黄藤酒时,死亡成为爱情最浓烈的显影;陆游题写《钗头凤》时,生命在遗憾中诗意地永恒。郑凌红以“爱无常”“爱不得”“爱别离”“爱有道”“爱心理”五卷,重构爱情史诗,实则是在解构传统叙事中“从一而终”的执念。书中的“红酥手”意象,既是对陆游原词的致敬,也是对当代情感困境的隐喻——那些看似温润的情感,实则布满时代压力的裂纹,层层剥开爱情的脆弱、无常与矛盾。

他以过来人的视角,畅谈爱情这场混沌修行。我们曾在其中泅渡、沉沦或牺牲。第五卷“爱心理”中“先救谁”的思辨,恰似萨特“他

人即地狱”的存在主义困境在婚恋领域的投射。第三卷“爱别离”里,作者剖析《前任3》的自毁仪式,用疼痛封存回忆,以体面分手纪念无法忘却。爱情非婚姻,无需物质介入,只需两情相悦。但婚姻不同,现代人的婚姻需强大的物质支撑。爱情走向婚姻途中,常被抛至路边,于是有人撕心裂肺,有人坚定从容。

即便在爱的修行中修得正果,也可能终融于生活琐碎,从惊天动地归于柴米油盐。这种爱情熵增定律,在书中具象为厨房里的计时器:热恋期的心跳加速,被熬汤火候的精准控制取代,情感的量子纠缠终将坍缩成日常生活的经典物理。但郑凌红并未陷入虚无,他在第四卷“爱有道”中给出的解法颇具禅意:真正的爱情修行,不在抵抗磨损,而在接纳时间包浆的温润,如同莫高窟壁画历经风沙仍葆华彩。

书中提到的钟是小说《地上的天空》中的“来世婚姻协议书”荒诞情节,与《红酥手》开篇的“梦游体”形成互文。朱一围绕现世婚姻制度外寻找情感寄托,郑凌红笔下的人物则在虚实交织的梦境中重构爱情语法。这种双向突围,印

证了罗兰·巴特《恋人絮语》中的论断:爱情本质上是一场符号系统的暴动。

人类几千年文明史,无一部爱情史能给出爱情标准答案。《创世纪》的巴别塔寓言,在书中演化成更深刻的隐喻:当现代人用社交软件翻译情话、用消费符号包装承诺时,语言的异化何尝不是新型巴别塔的坍塌?但郑凌红在结语处留下希望的裂隙——爱情的终极智慧,或许就藏匿在那些未发送的微信草稿、未兑现的旅行计划、未说出口的清晨问候里。

“人生自是有情痴”,当郑凌红将经年历练化作文字时,那些浸透《钗头凤》残碑的遗憾、散落《地上的天空》的未竟之约,都在书页间重新凝结成光。我们突然读懂:所谓痴情,不是在时间洪流中堂吉诃德式的冲锋,而是在洪流经过的滩涂上坚持播种星火般的刹那真心。这种清醒的痴意,或许正是郑凌红献给这个不确定时代最温柔的解药。

从生命教育到教育生命

——读《母爱的学问:名家忆母亲》

高低/文

翻开《母爱的学问:名家忆母亲》的目录,犹如推开一扇窗,窥见中国现当代文化名人内心深处的秘密花园。老舍、季羡林、史铁生、铁凝、袁隆平等三十八位大家,以各自独特的笔触,描绘出“母亲”这一永恒形象的多面性。此书的独到之处,在于主编朱永新,这位教育大家,并未简单汇编这些感人散文,而是从教育学视角独具匠心地切入,将零散的母爱记忆编织成一部生动的“爱的教育”教材。

代序《母爱是一门学问》中,编者援引福禄倍尔与梁启超的论述,提出全书核心理念:国民的命运掌握在母亲手中。这一宏大论断,在书中每一篇私人记忆中都得到了细微而具体的验证。胡适在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》中,回忆母亲如何以“做人的训练”替代空洞说教;老舍笔下的母亲,则以“生命的教育”潜移默化地影响他,这种教育“不依赖文字,而是凭借行动与性格”。母亲虽非职业教师,却是孩子的启蒙者;母爱虽非系统知识,却是最基础的人文课程。

书中母亲形象多姿多彩,打破了传统“慈母”的单一印象。郭沫若笔下因摘花而严厉责罚的母亲,资华筠文中“从不轻易表扬”的严母,铁凝笔下的正义母亲,共同勾勒出一幅立体的母教画卷。编者精辟指出:“真正的母爱兼具威严与柔情。”

那些细腻动人的细节描写,为母爱增添了最生动的注解。季羡林的“永久的悔”、袁隆平视穗观天的启蒙、史铁生的欢歌树、莫言记忆中母亲的歌声、三毛笔下的灯下身影,无不彰显母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子女的精神世界。这些文字证明:最深刻的教育往往源自生活细节。

从教育学角度看,这些文本揭示了一个重要命题:教育源于情感连接。苏雪林的民间故事启蒙、吴冠中的审美培养、梁从诫的唐诗诵读,都表明母亲的教育优势在于通过情感纽带传递价值观。编者言:“扣纽扣的同时,也在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。”

在当代教育焦虑的背景下,书中的母教智慧显得尤为珍贵。琦君“做人要像糯米糕般柔软”的教诲,宗璞“春天从不慌张”的箴言,毕淑敏

“回家不问妈妈”的感慨,都在提醒我们:教育的本质是培养面对未来的内在力量,而非规划具体路径。

书中那些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文字,如季羡林的悔恨、席慕蓉未送出的卡片,构成了爱的教育的最后一课:珍惜当下。这种遗憾教育,恰恰是现代教育体系中最缺失的情感课程。

《母爱的学问》最终呈现的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思考。老舍的“生命的教育”、余秋雨的“勇敢来自母亲”,都指向同一真理:真正的教育是生命对生命的影响。那些或许不懂教育理论的母亲,却深谙教育的核心秘密——以生命影响生命。

合上这本书,恍然大悟编者为何将这些散文称为“学问”。这门学问不授予学位,却塑造人格;不设置考试,却检验生命。在技术化的教育领域,这些文字如同温暖的灯塔,提醒我们教育之初心——始于母亲的一个拥抱、一次注视,最终化为子女面对世界的底气。这或许就是本书最珍贵的启示:在谈论教育之前,我们首先要学会爱;而在学会爱这件事上,母亲永远是我们的启蒙老师。

鲜血梅花:出门远行,一场精神的漂泊

——读《鲜血梅花》有感

刘东丰/文

阅读余华的《鲜血梅花》是计划之中的事。自年初开始的余华文集阅读已持续三月,如今轮到《鲜血梅花》。

“一代宗师阮进武十五年前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。”小说以江湖恩怨开篇,这是上世纪80年代武侠小说的典型叙述方式。那个时代,多少少年梦想仗剑天涯,我仿佛看到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中少年的未竟之路。

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中的少年,背着红背包,执着追寻“旅店”,却在黄昏的山路上屡屡碰壁。殷勤的卡车司机转瞬变为施暴者,满车苹果在哄抢中滚落山崖,连红色背包也被践踏成泥。那时我想,若少年有一身武艺,何至于此。

少年出行,应有利器。于是,《鲜血梅花》来了,江湖成名标志物梅花剑落在了少年背上,但这柄利器却比红背包更添血腥。梅花剑在少年父亲手中成名,也伴随着他倒在清晨的屋外草地。谁有这样的本领?不清楚,只知是死于两个黑道人物之手。鲜血预示着杀戮、仇恨,十五年后,少年背负宝剑,踏上报仇之路。

若无小说开头的唤醒,仗剑出行的梦想或许只能埋在儿时记忆深处。长大后,那些梦中的飞舞、一剑荡平天下事,都成为了历史的沉淀。在余华的小说中重见这些,尘封的记忆倏然而至。恰在阅读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之后,我有时感觉

自己也在那条漫无目的的大道上。

小说名“鲜血梅花”,看似预示江湖腥风血雨,实则只是茫然的寻找和出人意料的报仇成功。少年不会武功,他的报仇只是无知的行走。家世对他无意义,母亲的决绝预示着他没有回头的可能。他的存在,就是漫无目的的无知行走。就连血海深仇,也被别人早已报掉。他只能茫然回忆出行的每一个巧合。

寻找杀父仇人是母亲交给少年的任务,但当他得知仇人已死时,心中并非高兴,而是一种失重的滋味。寄予一生的东西突然不在了,生活真是笑比哭还难。余华为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预留了一个车厢,却给这肩负血海深仇的少年留下了茫然的十字路口。是茫然无知地出行,还是给自己一个目标活着?绝望的尽头,也许是另一种希望。

《鲜血梅花》有武侠小说的开头,却没有快意恩仇。余华给少年的只是一个行动。背起红背包或背负绝世宝剑出行,都已不重要。未来的旅途,高低起伏、大江大河、洪水激流,足以改变一往无前的行程。顺其自然是一种姿态,奋勇向前是一种追寻。茫然的十字路与心灵的栖身地,皈依于出行的自觉。

当取人性命的梅花剑成为标志物,“鲜血梅花”预示的血腥成为云烟。惯例和预设只成为假设,茫然和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。时光经不起消耗,希望经不起打击。顿悟的刺痛需要痛彻心

扉,绝处逢生不是上天飘来的慈悲。远行的背囊,需要装下信念与坚毅。

余华用《鲜血梅花》撕碎了武侠叙事的浪漫外衣。少年背负的梅花剑,与其说是利器,不如说是命运的枷锁。对无武功的少年来说,复仇成了荒诞的符号,如同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中始终找不到的“旅店”。人们总以为使命必达,最终却发现结局与理想早已分离。

人生本无预设的意义,唯有行走本身构成全部答案。梅花剑上的血痕,是旁观者强加的想象。余华以冰冷的笔锋挑破少年热血的幻象:江湖没有快意恩仇,只有无目的的行走与偶然的终结。唯有行走本身,才是最后的姿态。

